

第一章 文体源流

第一节 文体的产生

文体，一般指文章的体式。文章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。广义的文章，都包括文学作品和实用文章；狭义的文章，一般单指实用性文体。体式，指由于用途、内容和形式的不同而产生的文章类别，又称体裁、体制或样式。

文学和文章，在古代统称文，使用的是广义的概念。从形式上看，它们都是独立成篇的、有组织的书面语。而狭义的概念则主要从写作特点考虑，又各不相同。

从文学与文章的产生与发展看，它们虽同一源而演变却都彼此有异。但由于在演化过程中互相影响，彼此渗透，往往缺乏明确的界限，在文体区分上也往往造成一些混乱和困难。古代“文学”一词既指文章博学，又是文章、学问的缩称。《论语·先进篇》中的“文学：子游、子夏”就包括文章写作学科，或指文章之学。先秦时期将哲学、历史、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。“文章”一词，起初主要指文采如《楚辞·九章·橘颂》：“青黄杂糅，文章烂兮。”还指文辞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：“文章尔雅，训辞深厚”。而作为文章体裁，则包括了诗赋等文学作品在内。至于以“文”命名的著作，如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、陆机的《文赋》、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、萧统的《昭明文选》。其所评论和选人的既有文学作品，也有实用文章。尽管如此，文学和文章的产生则是完全不同的。

文学是我国悠久的灿烂的古代文化的精华部分之一。随着原始初民的生产劳动就产生了文学艺术。根据《礼记》、《淮南子》等

古籍文献的记载，远在文字发明以前，初民在长期的集体劳动中，就产生了音乐、舞蹈和诗歌，三者结合在一起，有的是生产行为的重演，有的是劳动过程的回忆，或者是祭祀祈祷的韵语。古代相传为伊耆氏的《蜡辞》、舜的《祠田辞》和《田者祝》都具有这种咒语的性质；初民运用这些原始的文学艺术形式，作为鼓舞自己进行生产劳动的力量，或者作为咒语来帮助自己同种种自然灾害进行斗争。

同时，原始初民还通过自己对于自然界、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朴素的理解，运用不自觉的艺术方式，对自己产生的种种幻想进行加工，用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心愿。他们创造的《后羿射日》、《夸父追日》、《精卫填海》、《女娲补天》等优美的神话传说既根源于现实生活，又反映他们战天斗地、制服自然的坚强意志。

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初民的诗歌、韵语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。而由于文字的产生和阶级社会的出现，一方面，文字片断地记载了远古口头流传下来的诗歌和传说；另一方面，统治阶级又利用文字通过巫祝祭告或代鬼神发言，以及通过史官、乐师创作颂扬自己的乐歌等形式，来表达自己的意志。同时，劳动人民还不断通过民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，既有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社会现象，又有劳动人民的愤慨不平与反抗，还反映青年男女的婚姻与爱情，以及农事活动的情景。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量出现的这些诗歌被整理成为《诗经》按乐曲的不同分为风、雅、颂三个部分，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。

文章是随着文字的出现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。《文选·序》说：“逮乎伏羲之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”造书契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，画八卦则为写文章创造了条件。从甲骨上看到的殷商卜辞的章句，记述了当时的宫廷大事。还有简奥的西周铜器铭文，也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生活片断和社会侧影。这些最早的历史记录，今天看来很难说是文章，但的确是实用文体的雏形。

被称为“上古典谏训诂之文”的《尚书》又称《书经》是记言的古史。韩愈认为其中大多“佶屈聱牙”，但确有不少生动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。其中的《盘庚》三篇是史学公认的殷商遗文。文中有“予若观火”、“若网在纲”、“若火之燎于原”等大量富有形象性的语言，很富有文学性的色彩。这是一篇由记事发展到记言的文章，是应用文发展的一大进步。有人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内容繁复、结构完整、语言生动的文章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经孔子修订的鲁史《春秋》体例仍非常简略，实际是提纲式的记叙文，但它的“书法谨严”，“一字之褒荣于华衮，一字之贬严于斧钺”，具有严格的倾向性。而且语言简练，明白易懂，标志着纪实散文的巨大变化，对后世有重要的影响。

从上面可以看出，不论文学（文学文体还是文章实用文体），尽管其产生的情况和先后并不一样，但都来自社会生活。穷其源都是相同的。两者不过是同出一源的两条壮阔浩瀚的洪流大川。它们在奔腾前进的过程中，不断出现支流，又时而互相汇合，因而在不同时期形成千姿百态的种种文体，还出现了绚丽多彩的宏篇巨著，而文体又以丰富多彩独步世界文坛。

第二节 文体的演变

文体的演变，可以分为几个时期。

一、先秦时期

从上古到春秋战国，我国众多的文体已经萌芽，有的已比较完善，而有的更加蓬勃发展。许多作品不仅当时就脍炙人口，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大的影响。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。

在文学文体方面，先秦时期的主要成就是诗歌。

最早的诗歌是原始型的二言体诗。《弹歌》据说是黄帝时代的

歌谣是记述古人用弹土丸狩猎情景的：“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穴（肉）。”《周易》中的《中孚·六二》是一首写战争得胜归来的情景的歌谣：“得敌，或鼓，或罢，或泣，或歌。”这些都是简单的二言一句形式，浑朴自然，却音节顿挫，很容易在口头流转。

此后，诗歌由二言体发展到四言体。四言体是《诗经》篇章的主要形式，这些诗篇大部分是民歌，少部分是贵族作品，都是可以歌唱，有的扮有舞步。《诗经》的首篇《周南·关雎》便是这样。在篇章结构上一是出现了分章复句的形式，二是开始用韵。《诗经》中还有长短不同的句式，如杂以二言、三言、五言，以至七言、八言等，这些都属于变格，对后代格律诗的出现产生了影响。

战国后期在南部楚国，出现了新诗体“楚辞”。楚地盛行“巫歌”和民间传说，有丰富的幻想和浪漫色彩。楚辞的代表诗人是伟大的爱国者屈原，他吸取了北方诗歌形式的精华，又接受了本国乡土文学的深刻影响。他写的《橘颂》、《天问》等是诗经四言体诗的变化，而他的代表作《离骚》和《九章》、《九歌》等有着鲜明的地方色彩。不仅内容有极其丰富的想像力和神话的魅力，而且大量地使用方言土语入诗，句中和句尾多有南方的语助词“兮”字。楚辞中开始出现了诗歌标题，显示全篇的主题思想。屈原的《楚辞》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次创新，对古代文体的发展，起到了重大的作用。

至于神话，除了《山海经》搜集了一部分外，基本上散见于古籍中。神话到先秦虽未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，但它对后代的小说、话本以及其他作品产生了影响。

在实用文体方面，春秋时代已发展成了比较完备的各种文体。北齐颜之推认为，“夫文章者，源出五经”。不少人赞同这一观点。实际上，《诗》是文学文体，而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是纪实文体。但它们都不是源而是流。而且除《诗》以外，大多是古代多种实用文体的收集与整理，当时《书》中就有诏令、训诰等多种形式，

这是实用文体的一大进步。到了战国时代，历史著作和学术著作勃然兴起，成了古代实用文体的两个高峰。

历史著作的代表可推《左传》和《战国策》。它们主要记叙春秋以来的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，以及逸闻趣事，对许多历史事件和场面有具体的情节和细致的描写，注意语言技巧和逻辑修辞，有浓郁的文学色彩。学术著作的发展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。早期产生的《论语》记载孔子及门人的言行，简洁而流畅。《孟子》仍为记言体，记载孟轲的言行，而气势奔放，言辞犀利，灵活善譬，论理服人。《墨子》质朴纯厚，讲求逻辑。《庄子》想像丰富，奇气袭人。《荀子》设譬精警，结构缜密。《韩非子》峭刻锋利，剖析透彻。诸子的不同流派表现出不同的风格，且汇进了不少文学因素。

先秦实用文体的两座高峰，一般被称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，它们中的许多篇章一直被公认为文学宝库中的珍品，实际上已经奠定了记叙文和论说文的基础。这些著作中还有一部分书信体文章，如《战国策》中的《乐毅报燕昭王书》已为抒情文肇端。

二、秦汉时期

秦统一六国，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国家，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转变。由于政治的需要，正式确立了“诏令”体。泰山、琅琊、芝罘、会稽等处的石刻，模仿雅颂，可视作“碑志”体的起始。李斯的《谏逐客书》、《焚书议》等可视为“书”、“议”体。秦代二世而亡，文体上并没有多大成就。

两汉继承先秦，在文学文体和实用文体方面得到新的发展。

文学文体最发达的是汉赋。汉赋继承了楚辞的某些特点，又熔铸了诸子散文的辞采与气势，实际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文学体式。两汉以后还演变成骈赋、律赋等形式。

从汉初的枚乘到汉武帝时的司马相如，是汉赋发展的重要时

期。《七发》是枚乘的代表作，标志着汉赋的形成与发展，对后世很有影响。司马相如进一步吸取楚辞的表现手法，极力铺陈西汉全盛时代的气派，具有一定意义；但也不乏排比堆砌的弊端，对后世产生了形式主义的不良影响。东汉后期的抒情小赋，风格由典雅变为清新，是六朝抒情赋的先声。

汉代的诗歌体由《诗》和楚辞发展为“乐府诗”，是一种由音乐机关——乐府搜集整理而演唱的配乐歌词。它继承并发扬了先秦诗歌体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，以杂言为主，渐趋五言。内容上还开创和发展了叙事体诗，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故事情节。如《陌上桑》、《东门行》和《孔雀东南飞》等，一直脍炙人口。唐诗中的“歌行体”就受到很大影响。此外，还有不少不曾入乐府的民间歌谣，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。

在乐府民歌和民间歌谣的影响下，东汉末年大量出现了文人笔下的五言诗。有名的《古诗十九首》可作为代表。五言诗进入文坛，就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，对以后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实用文体发展到汉代出现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这样伟大的著作。特别是《史记》，它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，标志着历史文体的辉煌成就，是一座光芒四射的金字塔。

《汉书》具有结构严谨和语言带有骈丽文采的特色，也给后世以深远影响。汉代的论理文不如先秦诸子的散文丰富多彩。但都“切于世事”，质朴厚重。其中有名的是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，借古喻今，气势磅礴，堪称典范。其他还有晁错的《对贤良文学策》、王符的《潜夫论》、王充的《论衡》等，都有一定的价值。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杂类实用文体相继出现。如诏令、奏书、议策、书表、史叙、序叙等应用文都已出现并有了发展。特别是“序”这类新文体，既可叙事，又可论理。还有两汉的一些信札，如司马迁的《报任书安》、杨恽的《报孙会宗书》，以情动人，是书信和抒情文的一大发展。这类

实用文体，为以后应用文体的发展积累了经验。

三、魏晋南北朝时期

魏晋两代历时不久。晋室东渡后又形成南北朝对峙和长期分裂、朝代更迭的局面。政治社会不安定，以致不论文学文体还是实用文体发展都不及两汉，但一些新的文体已开始出现。

在文学文体方面，五言诗有了新的发展。汉末建安以曹操为代表的一批作家，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，在极度离乱的时代表现了建立安宁社会生活的愿望、理想与壮志。王粲、陈琳等“建安七子”的诗歌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。蔡琰的诗歌也有很高的艺术成就。这一大批作家艺术成熟，风格多样，建立了“建安风骨”的优良传统。一直到两晋六朝，还是五言诗兴盛的重要时期。然而东晋的诗坛受士族腐化气息的影响，主要是玄言诗统治，内容贫乏。直到陶渊明的田园诗才放出异彩，并为以后的山水诗所继承。

南北朝值得一提的是乐府民歌，这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后的新发展。南朝乐府以写男女爱情的内容为多，相当一部分是男女对唱，相互赠答的。形式以五言四句的短章为主，歌词中有双关隐语的广泛运用。北朝的民歌题材广阔，除歌唱爱情外，还有反映战乱疾苦、边塞风光的，多为五言四句形式。《木兰诗》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，与汉代《孔雀东南飞》堪称我国古代诗坛的“双璧”。

南朝宋代鲍照的七言乐府诗推动了七言古诗的发展。早在《诗》、《骚》中就有七言句式，西汉有完整的七言歌谣。鲍照是文人试作七言诗的关键人物，他的七言体诗取得了高度成就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此后写七言诗的越来越多，七言古诗的体式也奠定了下来。

古代的神话传说长期沉寂以后，到魏晋南北朝又以小说的形

式大量产生和发展。主要有志怪小说和志人杂记两大类。志怪小说以于宝的《搜神记》为代表。志怪小说直接影响到唐代的传奇和清代的《聊斋志异》。志人杂记以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为代表。以后的小说、戏剧的内容都受到这种笔记文的影响。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是一部山水小品，给以后的山水游记以深远的影响。

在实用文体方面，这一时期出现了骈体文。它产生于魏晋，盛于南北朝。当时的宫廷应用文受到诗赋等文学体裁的影响，在文章中广泛使用“俪辞”等排比对偶句子，以四六字为主，讲究修辞和声律，句式整严，词语对仗。由于过于注重形式，难免束缚内容。它的文学性很强，但并不是文学体裁，很多应用文都受到它的影响。

在实用文中，属于奏议类的“表”和“启”也兴盛起来。“表”用以陈述政事，表达真情。“启”是奏和表的分枝。属于“诏令”的军事讨伐文书“移檄”也得到发展。属于碑铭类的“墓志铭”也出现了。其中庾信的《吴明彻墓志铭》被誉为“绝唱”。序、书、传一类文体，也有一些名作。

四、隋唐宋五代时期

隋统一了全中国，但为时很短。接着是大唐帝国。初唐时期，国家昌盛，社会安定，文化繁荣。中晚唐仍保持相对平稳局面。不论文学或文章都全面发展，取得辉煌成就。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，到了宋代，各种文体基本上已经齐备，且保持了继续发展的势态。

文学文体方面，唐诗的成就是我国文坛的一座高峰，诗人辈出，作品繁多，题材广泛，形式和风格丰富多彩。初唐的沈佺期和宋之问总结了齐梁以来格律诗创作的经验，提出了成熟完整的格律形式，从而完成了近体诗的创制，五七言诗的绝句和排律的各种要素都定型下来。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四杰又努力摆脱齐梁宫廷诗的轻靡之风，扩大了诗歌的思想内容，推动了唐诗的迅速

发展。到了盛唐，诗人如群星丽天，各名家的著作都大放异彩，各种风格流派也争奇斗妍。其中著名的有边塞诗人高适、岑参、王昌龄、李颀、崔颢、王之涣等人，也有山水田园诗人王维、孟浩然等人。特别是李白，把浪漫主义的诗歌推向新的高峰。伟大的诗人杜甫和白居易则是现实主义的代 表，他们的许多名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中唐还出现了元结、顾况、刘长卿、韦应物、李益、刘禹锡、李贺等名诗人。同时，也出现了“大历十才子”崇尚绮丽诗风的形式主义逆流。而晚唐，杜牧、李商隐的诗又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，温庭筠、韦庄等人的诗则内容消沉，崇尚纤巧。总的说，近体诗在艺术上有所发展。传统的古体诗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充实发展。特别是创始于杜甫，由白居易倡导，元稹、张籍、王建等积极参加的新乐府运动，它是用新题写时事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，他们写的反映民间疾苦、批判黑暗统治的大量讽喻诗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相当高的成就。

宋诗继承了唐诗的传统，出现了许多有名的诗人。王禹偁、欧阳修等扫除了西昆体的浮靡诗风；王安石、苏轼进一步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和表现艺术，使近体诗再一次发放光彩。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把诗歌创作引向脱离实际。而南宋的伟大爱国诗人陆游和范成大等人则脱颖而出，创作了大量的爱国主义名篇。

宋词是唐宋文学文体的又一座高峰。最初产生于民间，同时受到外来音乐和近体诗的影响。唐五代时称为曲子词，又称“长短句”或“诗余”。它同乐府一样可以配乐歌唱，又称为“近体乐府”或“乐章”。曲词原由乐工、歌妓加工。中唐前后，文人配乐而写词，一直沿袭按词谱填词。一般认为文人作词以李白的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为最早。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、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也很有名。晚唐、五代，许多贵族和上层文人把词作为花间樽前娱宾遣兴之作，带上齐梁宫体的色彩，被称为花间派词。南唐词在艺术上有所发展。李璟、冯延巳、李煜等都是有名的诗人。后主李煜的成就最

高影响也大到了两宋词发展到鼎盛阶段，成为一种可以独立抒情达意并与诗并行发展的文学文体。宋代许多有名的文人都是词人，如北宋的晏殊、欧阳修、柳永、苏轼、秦观、周邦彦等人，都各有成就。南宋的李清照、辛弃疾更值得称道。李清照在艺术上自成一格，在韵律和理论上也独有成就。辛弃疾的词体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不得志的满腔激愤，其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成就形成南宋的爱国词派。

唐代传奇是文学文体的又一奇葩。传奇继承了古代神话、传记文学和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优秀传统，又从其他文体中吸取了营养。初唐的传奇，志怪色彩很浓。中唐盛极一时，已经反映了现实生活。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爱情小说，元稹的《莺莺传》还反映了妇女大胆争取爱情自由和反抗封建道德。以后曾被改编为多种文学文体，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和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极为有名，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喜爱。晚唐大量的传奇搜奇猎异，价值不高。唐传奇是我国古小说的里程碑，至此小说正式成为完备的文体。

到了宋代，小说发展为两大支流——文言笔记小说和白话话本。变文又发展为讲唱文学。话本和变文的结合直接反映都市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，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其中“讲史”和“小说”影响最大。这些标志着文学文体的新发展，对后世的戏曲、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在实用文体方面，从唐代开始延续到宋代的古文运动，完成了文体的革新，是文坛史上的划时代创举。六朝时期，骈文独霸文坛，片面追求华丽辞藻和声律对偶之风日盛，文章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日益繁荣发展的需要。唐初陈子昂等一批有识之士便高唱复古，开始了反对骈文的斗争。到了中唐，由韩愈倡导，柳宗元支持的反对骈文、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，便得到了广大社会力量的热烈拥护。柳宗元散文的成就很高，特别是小品，无论寓言、游记、传记，都短小精悍，寓意深远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到了宋代，欧阳修

王安石、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曾巩等标榜师承韩柳，号称“唐宋八大家”，风格各异，自有特色。

古文运动推动了应用文的迅速发展，文体类别繁杂。序跋、论说、杂记、碑铭、传状、箴戒、哀祭等文体，不断有所创新。序跋文，本用于文章前篇，始于汉代，但未成专门文体。唐时序又称“引”，著者日多。韩柳变骈体为古文，名篇佳作不少，使这一文体面目一新。山水游记始于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，而奠基于柳宗元。柳的《永州八记》，借山水寄情言志，技艺精湛，对后世影响甚大。传状已发展到写身职卑微的人物。箴戒文短小精悍，不乏寓意深刻、劝诫世人的寓言和小品。此外，一些公牒文也讲求内容和修辞，有的成为具有文学因素的传世之作。

五、元明清时期

元明清三代各种文体仍继续发展，趋于成熟，为现代文体的产生和完备准备了条件。

文学文体方面，引人注目的是元曲，包括歌、舞、说白，并有故事情节的杂剧，以及入乐可歌的散曲。杂剧是利用散曲中的套曲形式而创作的歌剧，亦称剧曲。又因产生于北方，也称“北曲”。伟大的现实主义戏剧家关汉卿所写的《窦娥冤》、《蝴蝶梦》、《救风尘》、《望江亭》等都是传世之作。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是杰出的巨著。还有不少作家致力于散曲的创作，其中马致远、关汉卿，白朴等人，都很有名。

宋金对峙时期，南方产生南乐配合的“南曲”。它又称为“南戏”。它与北曲有共同的艺术基础，体制则有所不同。南戏在元朝时被元曲压倒，到明代就兴盛起来，中叶日趋繁荣，出现了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这样的杰出作品。清代的戏曲进一步发展，洪昇的《长生殿》、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都是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。到了清代，地方戏占据重要地位。特别是京剧走进宫廷，日趋成熟和发展。

元明清的诗歌，一般只能“规唐抚宋”。清代却出现了诗、词、曲方面丰富的理论著作。

宋元的话本到明代有了新的发展。不少文人由加工话本进而创作了大批拟话本，著名的有冯梦龙的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和《醒世恒言》合称“三言”，凌蒙初的《拍案惊奇》初刻及二刻合称“二拍”。它们对以后的小说和戏剧创作都具有影响。清初出现了文言笔记小说。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成就很高，最为有名。

明代勃兴的章回小说是文学文体灿烂的新星，它是在宋元长篇“讲史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罗贯中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是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的典范。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是农民革命的史诗。接着是吴承恩的浪漫主义神魔小说《西游记》问世。到了明后期，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大量出现，具有代表性的是许仲琳编辑的《封神演义》。《金瓶梅》则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巨著，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，真实姓名已不可考。到了清代，长篇小说和文言小说进一步发展。曹雪芹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《红楼梦》是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；高鹗的续作部分则远不如原书。此外，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还有李汝珍的《镜花缘》、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等。晚清的小说数量特多，而质量粗糙的不少，较优秀的只有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老残游记》等。

从元至晚清的实用文体，继承上世明代的杂文有“论”、“序”、“跋”、“书”、“记”等。公安派袁宏道的游记成就最高。徐宏祖的《徐霞客游记》名闻中外。清代的桐城派有不少记事小品、山水小品；应用文以碑志、传状居多。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文化科学的发展，学术著作较多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说明文不断涌现。继宋代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之后，又有元代王桢的《农书》。明代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、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、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、清康熙御定的《数理精蕴》等都很有价值。晚清以后，随着社会政治的激烈变动和旧文体的改革，一些新文体不断出现。比如报纸

和刊物的兴办，产生了以浅显古文和通俗白话写新闻和论文的文体，以利于启迪民智和宣传革命思想。这为新文化运动准备了一定条件。“五四”运动以后，进入了白话文写作的新阶段，大量的新文体就不断涌现和日趋繁荣了。

第三节 古代文体理论

这里，从文体分类和文体理论两个方面简述。

一、初创时期

西汉刘歆辑六艺群书种别著《七略》，分为辑略、六艺略、诸子略、诗赋略、兵书略、术数略和方技略。其《诗赋略》又对赋作了分类。他主要是目录学家，对文体的分类也作了有益的尝试。东汉班固撰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在《七略》的基础上将部录专书分别为六艺、诸子、兵书、术数、方技等“五略”，又将单篇诗赋辑为《诗赋略》，其下分屈原赋、孙卿赋、陆贾赋、杂赋等四类。前三类以作家为纲，杂赋类则按制体和题材分为十二种。文只是由于编辑的需要，并无理论依据。

汉末的蔡邕著《独断》。书中将帝王命令群臣的文书分为策（封土、授爵、免官，并记于简册）、诏（布告君民）、制（重大制度的兴革）、戒（戒敕文武群臣）四类。将群臣上呈帝王文书也分为章、奏、表、驳议四类。他并按照文章功能对分类作了说明。当然，这只是对文体分类的解释而非真正的文体论。

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可说是第一部重要文论。文中不仅提出了文章的价值、作家的个性和作品的风格问题，还正式发表了文体理论：“夫文本同而末异，盖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，此四科不同，故能之者偏也，唯通才能备其体。”它涉及的文体范围还有诗赋，比蔡邕要广，而且提出各种文体既有共同原则，本

同)又有特殊要求(未异)四种文体的社会功能、表达特征和写作要求都不一样,因而作家各有专长。曹丕的分类和论述还嫌简略,也未必十分中肯,但确是文论和文体论的发端。

晋朝的陆机写了著名的《文赋》,这是文坛上第一部系统的文论专著。可以说陆机是文体论的建立者。他具体论述了文体:

故夫夸目者尚奢 惬心者贵当 言穷者无隘 论达者唯旷。
诗缘情而绮靡。赋体物而浏亮。碑披文以相质。诔缠绵而凄怆。铭博约而温润。箴顿挫而清壮。颂优游以彬蔚。论精微而朗畅。奏平彻以闲雅。说炜晔而譎诘。虽区分之在兹,亦禁邪而制放。要辞达而理举,故无取乎冗长。

这里列举了诗、赋、碑、诔等十种文体的特征和写作要求。他的某些观点尽管后人还有不同见解,但比曹丕进了一大步,并有更多更深入的析究和精辟的阐述。

二、发展时期

比陆机稍晚的挚虞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文体论专著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他选辑前人作品按文体及源统编排为《文章流别集》四十一卷;又著《文章流别志论》二卷,专门论述文章各种文体的性质、起源和发展变化,可说是文体论的奠基石。可惜这两书均已亡佚。

与挚虞同时的还有李充的《翰林论》三卷,现只剩残文。他论述的文体比挚虞简略,但对各类文体的产生、流变、特点和要求颇有识见。到南朝梁任昉《文章缘起》专论文体起源。

梁代著名的文论家和著作是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和萧统的《文选》。内容完整 博大精深 成就很高 影响巨大。

《文心雕龙》共十卷五十篇,旨在探讨不同文体的源流和特点,

以及写作理论。其中二十篇属于文体理论。《文心雕龙》对文体的划分 主要特点是“ 论文叙笔 则圉别区分”(《序志》篇)文笔之分 是晋代以来流行的说法 以有文饰的韵文为“ 文 ”其他朴实无韵的实用文为“ 笔 ”，这是当时辞藻华美的骈文盛行所产生的影响，实际是重文轻笔的反映。刘勰也采用文笔之分的观点，《总术》篇说：“ 今之常有文有笔 以为无韵者笔也 有韵者文也。”但他有很多创见。

首先 他文笔并重。文有辨骚、明诗、乐府、论赋、颂赞、祝盟、铭箴、诔碑、哀吊九篇 计骚、诗、乐府、赋、颂、赞、祝、盟、铭、箴、诔、碑、哀、吊十四种文体。笔有史传、论说、诏策、檄移、封禅、章表、奏启、议对、书记九篇 计史传、论、说、诏、策、檄、移、封禅、章、表、奏、启、议、对、书、记等十六种文体。杂文、谐隐两篇则文笔相杂 计杂文、谐、隐三种文体。除了这三十三种以篇名标示出的文体外，还有许多细类。如论说中又有传、注、评、序等 书记中有谱、籍、簿、章、方、术、召、式、律、令、法、制、符、契、券、疏、关、刺、解、牒、状、列、辞、谚等 杂文中又有对问、七、连珠等 基本上是“ 笔 ”。论述的文体范围笔远多于“ 文 ”。

其次，他对各类文体作了细致而周详的考查，对每种文体基本上都能正确而具体地论述其渊源、特点和要求，以及类似文体的区别 还举出许多典范的例文。这就是他说的：“ 原始以表末 释名以彰义 选文以定篇 敷理以举统。”(《序志》)如：“ 汉定礼仪 则有四品 一曰章 二曰奏 三曰表 四曰议。章以谢恩 奏以按劾 表以陈情 议以执异。章者 明也；……表者，标也。……章表奏议，经国之枢机。”(《章表》)他认为史传的写作要点是：“ 明白头讫之序 品酌事例之条 晓其大纲 则众理可贯。”(《史传》)他反对史传中为渲染事迹而违背史实，抨击对人物褒贬倒置；他还对史传失真的原因作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。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。

第三，他重视诸子散文，《诸子》一篇充分肯定了先秦诸子著

作。他说：“诸子者，人道见志之书。”认为是对治国的道理表达各人主张的著作。他对诸子十八家之书，分别各作评论，既肯定他们的书丰富多彩，也提出学者“宜撮纲要，览华而食实，异邪而采正，极睇（注意观察之意）参差”，即是要去芜取精，这无疑是正确的。然而诸子散文，各自成家，笼统作为一种文体与其他文体并列，是不很恰当的。

第四 刘勰把《宗经》、《辨骚》都放在文体总论中。他没有对“五经”的文体加以划分，而是将“五经”作为一切文章体式的渊源，体现了他“文出五经”的观点。至于《辨骚》一篇，实际是对文体的论析，应作为文体论看待，这里体现了他对“骚”体的特别重视。

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，世称昭明太子。他所编的《文选》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文章总集，亦称《昭明文选》。书中所选诗文作品按文体分为三十九类，即赋、诗、骚、七、诏、册、令、教、策、表、上书、启、弹事、笺、奏记、书、移书、檄、难、对问、设论、辞、序、颂、赞、符命、史论、史述赞、论、连珠、箴、铭、诔、哀文、碑文、墓志、行状、吊文、祭文。其中赋类又分京都、郊祭、耕籍、畋猎、纪行、游览、宫殿、江海、物色、鸟兽、志、哀伤、论文、音乐、情等十五子目；诗类又分补亡、述德、劝励、献、公宴、祖饯、咏史、百一、游仙、招隐、游览、咏怀、哀伤、赠答、行旅、军戎、郊庙、乐府、挽歌、杂歌、杂诗、杂拟等二十二子目。

《文选》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对某些重要文体的源流、发展作了一定论述，这是萧统对文体分类实践的理论探讨。梁代重要的文艺评论著作还有钟嵘的《诗品》（亦名《诗评》），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的文体理论专著，也是诗话的鼻祖。

继钟嵘之后的还有唐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》。主要论述诗的风格，分诗为二十四类：雄浑、冲淡、纤秣、沉着、高古、典雅、洗炼、劲健、绮丽、自然、含蓄、豪放、精神、缜密、疏野、清奇、委曲、实境、悲慨、形容、超诣、飘逸、旷达、流动。这是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。

其后北宋李昉等的《文苑英华》一千卷 辑南宋梁末至唐代诗文 分文体为三十八类。

北宋姚铉辑的《唐文粹》一百卷，分文体为二十二类三百一十六小类。与《唐文粹》并称的还有南宋吕祖谦辑的《宋文鉴》一百五十卷、目录三卷 分文体为五十九类。元苏天爵辑的《元文类》七十卷、目录三卷，分文体为四十三类。以及明程敏政辑的《明文衡》（原名《皇朝文衡》）九十八卷、补缺二卷 分文体为四十一类。这些断代总集保存了各代作者原集已佚的诗文和部分社会历史资料，都具有一定价值。

明吴讷的《文章辨体》辑明以前的诗文 分文体为五十九类按时代先后分类解说和评论；卷首还附“诸儒总论作文法”。本书的文体分类虽有繁杂之弊，对后世有不良影响，但在立论上仍有一定的创造性。

明徐师曾的《文体明辨》，在《文章辨体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。文首附“文章纲领”包括选辑前人的总论、诗论与文论。书中分文体为一百二十七类 比如诗便收有二十五类 赋分为古、俳、文、律四类 对于一些罕见的文体 如贴子词 乐语、右语、道场疏、青词等也有收集。本书庞杂的程度较《文章辨体》尤甚，这是不好的一面。但其内容的完备、收类的精细、论述的深入 比《文章辨体》却是一大进步。

其后贺复征据《文章辨体》体例 选先秦到明末文章修订成《文章辨体汇编》七百八十卷，分文体为一百三十二类。规模虽大，但分类芜杂 且有舛误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说它“有一体而两出者”；“有一体而强分为二者”；“有一文而见两体者”。这些也反映了当时文体研究工作中的不良倾向。

三、定型时期

到了清代，桐城派的古文家姚鼐辑《古文辞类纂》七十五卷。